

布哈林案件

東方出版社

布 哈 林 案 件

〔英〕肯·科茨著

王德树译 王复加校

東 方 出 版 社

Ken Coates

✓ THE CASE OF

NIKOLAI BUKHARIN

Spokesman 1978

根据英国“发言人”出版社 1978 年版译出

布 哈 林 案 件

BUHALIN ANJIAN

著者/[英]肯·科茨

译者/王德树

校者/王复加

封面设计/郭振华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4 字数/78,000

版次/1988 年 3 月第 1 版 198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046-6/K·14

定价 0.95 元



除斯大林以外的莫斯科审讯的主要炮制者：
维辛斯基(左上),雅戈达(右上),叶若夫(左下),贝利亚(右下)。





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被描画成所谓“右派和托派双头怪兽”，在后面牵着绳索的手上有“盖世太保”字样。

献给安娜·拉林娜和

尤·尼·拉林

假若能完全象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以及后来多次提到的那样，在苏联“恢复社会主义法制”的话，那么写这本小册子就完全没有必要了。遗憾的是，实际上那是有必要来一个运动的，因此也就有必要写这本小册子，作为对这一运动的贡献。

这本小册子是我们怀着共同的心愿献给那个人的遗孀和儿子的，那个人受到了不仅仅是他自己同胞的极不公正的对待。

目 录

第一章	前言	1
第二章	来自莫斯科的呼吁	5
第三章	罗织的罪状	12
第四章	全世界都感到内疚	65
第五章	进一步理解布哈林	79
第六章	是布哈林宪法吗?	91
第七章	要求平反	96
	* * *	
附录一	老布尔什维克的呼吁书	101
附录二	保罗·斯普里亚诺的《布哈林案件》一文	103
附录三	答《共和国报》记者问	107
附录四	第一批签名的人	112
	* * *	
后记	(若列斯·麦德维杰夫)	116
介绍几种参考读物		119

第一章

前言

贝特朗·罗素和平基金会经常收到不少政治犯及其亲友的来信。但有些时候，基金会也很难帮助这些来信人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因为我们始终缺乏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有时感到很难为一项必要的研究筹到经费和组织适当的反应。为了略为克服某些力所不及的艰难局面，我们经常与其他一些专门组织进行合作。我们尽管有困难，但还是以某种方式受理了各大洲、两大主要国家集团以及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案件。

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是直接继承贝特朗·罗素本人为公民自由所主动承担的义务，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德莱福斯案件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被拘留在布里克斯顿（同他拘留在一起的是马克辛·李维诺夫，他后来成了苏联第一任驻伦敦大使，后又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后来，罗素无疑是由于回忆起了他自己的这段经历，参加了几十次拯救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运动，其中包括从美国的萨柯和樊塞蒂案件到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的案件（拉科西在全世界的抗议声中仍被交给了苏联政府，而为匈牙利换来了一批老牌的傀儡人物）。到罗素建立起他的基金会时，他已接到了大量的邮

件，并且同时参加了保护二十多个国家的犯人。他使希腊的安巴蒂埃洛斯获得释放，使被劫持去的海因茨·勃兰特从东德监狱里释放出来，并使秘鲁开释了乌戈·布兰科。他参加了拯救一大批同波兰和苏联当局发生冲突的犹太人的运动。同时他还保护了遭到以色列政府歧视的阿拉伯人。所有这一切的情况都是极其复杂的，他经常甚至受到他帮助过的人的指责，说他前后自相矛盾。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真正自相矛盾的并不是他。

在他逝世以后，寄给他的信件还陆续不绝。我们甚至接到一些信，认为他还活着，并且仍在做着以卵击石的工作。我们经常为一些案件而苦恼，这些案件是他在我们之前已处理过的，但在新情况下又被重新提出来了。深深笼罩在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头上的处决的威胁，^①使我们回想起他被阿尤布·汗监禁时大家所必然产生的焦虑。本·贝拉（罗素曾为他做了大量的求情工作）仍然在监禁中，^②使他获释的一切努力还没有成功。现在已进入一九七八年了，我们正在为乌戈·布兰科进行第三次请求；如今他已是秘鲁国会议员，但显然仍处在易受逮捕和放逐的境地。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联当局便越发不重视罗素的意见，而且还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在罗马举行的拉丁美洲镇压事件罗素评议会期间，我们同巴维尔·李维诺夫（他刚刚被苏联驱逐出国）和伊利·佩利坎（他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出来的）进行了谈话，结果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一些大学方

① 布托已于1979年4月在拉瓦尔品第监狱被处死。——译者

② 本·贝拉已于1980年10月获释。——译者

面发出拯救这两个国家中一些特定犯人的呼吁，并得到了各国成千上万的人的支持。这样一来，我们就了解到一些从苏联来的信件，即使我们自己同苏联公民往来的某些信件被苏联当局扣压了。

但是，一九七八年春末，我们接到了一封性质不同的来信。这封信是从已被处决的苏联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的儿子那里寄来的。他请求重新审查他父亲的惨案，并在这封信（下一章还要介绍它）中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

正如我们将要证实的那样，布哈林案件至今仍是一个世人议论的话题。除非这个案件所引起的问题能在苏联国内开诚布公地让大家讨论，否则人们仍会议论不休。我们下面将尽力表明布哈林是无罪的，虽然我们完全知道这种观点已经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事实仍然是：苏联的执政党不顾大量确凿的证据，仍然否认这一点。拿罗素本人直接参与过的某些事情为例，我们就可以作出一个相应的类比。在被指控为替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罗森堡案件中，如果可以确认所有政府指定的主要证人都在撒谎，他们提出的证据十分之九纯属捏造，那么我们又能指望美国政府做些什么呢？我们也只好认为罗森堡夫妇太冤枉了。但是，就布哈林案件来说，虽然为了达到官方的目的而已经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可是这类证据同具有充分说服力和严谨性的证明是无法相比的，它只能说明布哈林同样受了冤枉，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冤枉还确实更厉害得多。布哈林的名誉所受到的污损，要比这两个被处决的美国人更为严重。在希斯案件中，如果惠特克·钱伯斯供认一切证据都是他个人编造的，那么反应

又会如何呢？布哈林案件的主要作证人都已去世了，因为他们都是在“招供”以后被处决的，但是苏联政府既为这些人恢复了身后的名誉，有时还给予他们荣典，那末它自己就证实了这些死者的案情是不真实的。

尽管有一些不幸的案件，但自从赫鲁晓夫先生讲了“恢复社会主义法制”以后，那种专断不公的程度在苏联显然大大减少了。不过，还有一些人天真地希望，社会主义总有一天会建成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公正的社会，他们会把苏联法院对这件事的拖延不决，看成是对大家的这种希望怀有强烈的和一贯的不满。

这个案件虽属旧事重提，却恰好关系到当代依然难以伸张正义的严重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桩冤案拖的时间越长，带来的痛苦也就越深。

第二章

来自莫斯科的呼吁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在莫斯科公开审讯了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被指控的共有二十一人，而在起诉十一天后，竟将全体被告判为有罪。其中十八人被判处死刑，并于宣判两天后的三月十五日执行；一人被判处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其余两人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这一事件发生后四十年，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会承认他相信这次可悲的审判有什么公正之处可言。但是苏联当局仍然不肯对这一案件进行适当的甄别，致使一些主要的当事人，特别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和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仍然蒙受着官方荒谬诽谤的耻辱。

在一次就镇压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的情况下，也许处决这些人是不太引人注目的。尽管在统计数字上对斯大林死刑名册的规模还有争论，但是毫无疑问，杀害苏联前总理和共产国际的一任首脑，毕竟在总的流血中添加了一点不易察觉的份量。¹但是从宪法的角度来看，这类司法谋杀的勾当对苏联社会的良心仍然是个沉重的负担，其原因将在下面论述。而且，只要这桩苏联历史上的可耻事件没有受到正视，哪怕斯大林时代的狂热症早已消退，苏联各族人民仍然不可能恢复自

已全部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也不可能恢复充分的合理性。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道：

“也许应该在莫斯科建造一座纪念碑，来永远纪念专横统治下受害的同志们。”

无论这座纪念碑是否建造，当时却有很多人希望今后保证对这件事进行实事求是的公开讨论。这一希望终于未能实现。自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官方一直明确地回避作这样的分析，因而国内出版的符合事实真象的苏联现代发展史，只能在地下出版物中传播；这些地下出版物经过辛勤的打印，再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

一九七七年六月以后，立即传开了这样一份文件：

“一九七七年六月初，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官员克利莫夫打电话到安娜·拉林娜（尼·伊·布哈林的遗孀）的公寓，要拉林娜同他进行联系。因为拉林娜不在莫斯科，布哈林的儿子尤·尼·拉林便于六月九日按照克利莫夫留下的号码给他回了一个电话，问他打电话来是否与布哈林的儿子和遗孀送去的信件有关。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他们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主席团、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本人寄去一些信件，要求为布哈林恢复名誉。克利莫夫肯定他打那次电话是与这事有关，并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奉命通知你，你们申请重新恢复布哈林在党内的地位和他
在苏联科学院的院士资格是不可能批准的，因为根据审讯他的罪

行而作的有罪判决尚未取消。’

尤·尼·拉林的回答是，很多布哈林的同案人都已恢复了名誉，并举了克列斯廷斯基、伊克拉莫夫和法·霍扎也夫为例。

克利莫夫答复说，拉林显然不知道还有绝大多数那次审讯的被告没有恢复名誉。于是拉林问道：‘你真的相信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杀害了高尔基吗？’克利莫夫答道：‘这个问题归法院和检察机关酌定。’拉林又问：‘这就是说，你认为我必须向这些机关申诉吗？’克利莫夫对此回答说：‘那是你的权利。’可是打开窗子说亮话，当前他不应当这样做。‘你应该知道现在情况有多么复杂。’

拉林娜和拉林在一九六一年就为恢复布哈林名誉的事提出了第一次申请。因此，这次驳回是在第一次申请十六年以后和最后一次申请一年半以后才下达的。（弗·伊·列宁的朋友叶·德·斯塔索娃和维·阿·卡尔宾斯基在一九六五年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但到他们相继去世以后，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接到了上述通知后，拉林立即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给苏联最高法院院长寄去了一份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请求书。”²

对请求书作出如此迟钝的反应，不管能不能归因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部门渴望宽恕斯大林，而令人可悲的是，拉林和他的母亲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为布哈林再度伸张正义以来，他们的努力竟毫无结果。

这说明了拉林为什么觉得必须请求恩里科·贝林格给予帮助。在下面这封不寻常的信件中，再现了过去三十年代末期那种令人恐怖的气氛：

“尊敬的贝林格同志：

我是在我父亲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惨死四十周年纪念日前夕给您写这封信的。父亲死时我才两岁，自然回忆不起我父亲的情况。但是我母亲却在斯大林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了许多年，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并向我讲了我父亲的真实情况。后来，有一位列宁的挚友、在大恐怖中幸存下来的老布尔什维克——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他在某些方面知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情况，向我谈起了他。此外，我还看了许多布尔什维克的书籍（这些书籍是在我国至今被查禁而在几位老布尔什维克手里侥幸保存下来的），其中包括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本人所写的书籍和外国研究者的著作。我靠这种办法得到的这些材料，有助于我充分了解我父亲的为人，以及他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我知道斯大林是罪大恶极的，知道他捏造党史至何等程度，也知道一九三七年二、三月中央全会对我父亲的指控和后来对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审讯都是十分荒谬和拙劣的。但是，我父亲就是在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从事间谍活动、叛国、搞破坏和谋杀）下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和判处死刑的。

一九六一年初，我母亲拉林娜以及后来我本人，都坚持不懈地向我们党和国家最高机关提出撤销对布哈林的荒谬指控和恢复其党籍的问题。以前党中央书记叶·德·斯塔索娃为首的几位资历最老的老布尔什维克，也向党的领导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都早已去世而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只是到了去年（一九七七年）夏天，我们才从电话里得到了几句回话。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一位官员用电话通知我们，由于那次审讯的文件尚未复查完毕，审讯中对布哈林的指控仍未撤销，所以恢复他党籍的问题还不能予以解决。这就是说，在处决我父亲四十年以后，我们总算得到了一个答复，而这个答复实际上仍然肯定了斯大林那些恶毒的指控。我向法院（苏联最高法院）提出的请求也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干脆就不给我答复。

在大部分居民都是用谎话连篇的《简明教程》教育出来的国家

里,有很多人仍然认为我父亲是个叛徒和希特勒的奴仆,尽管事实真相是:他是一位杰出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在他最后的岁月里,曾把全部精力用于揭露法西斯主义,向世人警告不断增长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我父亲最后一次离家去参加一九三七年二、三月中央全会的时候(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对我母亲说:‘你用不着难过,历史上有的是惨痛的错误。我希望我的儿子能成长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他把这次已经发生的事件早就看成是一出转瞬即逝的悲剧,因为他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不是一名党员,但我对我父亲来说,‘布尔什维克’这个词的含义,毫无疑问地就是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却无法为那个列宁在逝世前称之为‘全党所喜欢的人’的人去伸张正义。我的母亲从斯大林集中营的恐怖中活了下来,她知道列宁的许多战友,了解老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代表人物——这些人在她的回忆中给她留下了一些最愉快的往事,而她也总是满怀亲切和爱戴之情谈到他们。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对我母亲来说,简直是越来越不堪忍受。要我们这些仍然肩负着斯大林罪行的重担而无法把它抛到历史垃圾堆里去的人,能够去为崇高的理想奋斗,这是一件不能设想的事情。

贝林格同志,我向您求助,不仅因为您是西欧最大共产党的领导人,并已摆脱了斯大林罪行的重担,而且还因为尼·伊·布哈林是一位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一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积极成员。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认识他,并且经常热情地缅怀他。他们当中有些人还健在,还在意大利共产党队伍里工作着。我尤其记得翁伯尔托·特拉奇尼同志①。

我向您求助,请您参加为我父亲恢复名誉的运动,只消用您觉

① 翁伯尔托·特拉奇尼生于1895年,是意大利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他曾参加建立意大利共产党(1921年)的工作。——译者

得最适合于您的方式就行。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临死前不久还写了一封‘致未来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信，吁请他们替他‘平反昭雪’。我母亲在黑暗的年代里熟记了这封信的全文，并在她本人恢复名誉以后，将这封信交给了党中央委员会。这封信的结束语是：

‘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迈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忠实于您的尤·拉林(布哈林)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

罗素和平基金会得到这个信息，就将它发散到许多国家去征求签名，而获得了十分广泛的响应。在我们对这桩公案作出结论之前，还要进行更充分的讨论。不过，苏联当局既然坚持认为布哈林的无罪尚未能确立，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审查一下他定罪的证据究竟是怎么回事。

注 释

- 1 据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论述：“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斯大林在政治恐怖方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纪录。科尔内利·苏拉实行的‘公敌宣告’曾处死数千名罗马人。在提庇留、卡利古拉和尼禄这三个罗马暴君统治期间，又有几万罗马人被消灭。据说最残酷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所长托马斯·托尔奎马达曾活活烧死一万零二百二十人，并烧掉六千八百六十具逃亡的或已死去的异教徒的模拟象，此外还判处九万七千三百二十一人终身监禁、没收财产和穿一种名叫‘圣宾尼陀’的耻辱服。伊凡雷帝的沙皇特辖区制度使几十万人丧命，在这一制度最猖獗的时期，莫斯科每天有十至二十人被处死。在雅各宾恐怖时期，根据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的统计，由革